

江南农村发展研究丛书

Stud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Areas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Series

近代江南农村

段本洛 单强 著

江苏
人民
出版
社

RURAL
AREA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MODERN
TIMES

(苏)新登字第 001 号

书 名 近代江南农村
著 者 段本洛 单 强
责任编辑 金 石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地址:南京中央路 165 号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启东市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印 张 22.125 插页 5
印 数 1—1000 册
字 数 550 千字
版 次 199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273—3/F·259
定 价 24.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2 近代江南农村

土地改革的胜利和江南农村的春天(1949~1956年)。

近代江南农村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自然经济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作用,为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成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但是对自然经济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的作用,这首先取决于旧的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近代江南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自然经济的解体作用如何?为什么近代江南农村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缓慢?这些问题要从社会经济的内部结构中寻求答案。

—

明末清初,江南农村封建经济制度占着统治地位,其核心是地主制经济的租佃制。在地主制经济下,地权集中而使用分散,形成无数的小农经济体,除极少数经营地主之外,地主是以佃农的小农经济体作为自己的经济实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成为农村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自从租佃关系由分成租制大量地过渡到定额租制,劳动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佃农的封建依附关系相对松弛,生产上获得较多的自主权。可是江南地区明朝末年人口已缓慢增长,清朝乾隆年间人口增长迅速,耕地面积受自然条件限制,不可能相应增加,地少人稠,使租佃土地存在着竞争,佃农为了提高垫支能力以佃得土地,他们需要依靠农村副业,发展商品生产。同时小农经济的生产规模狭小,封建剥削苛重,为了缴租还债,佃农也不得不寻找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其他副业以作补充。自

耕农不受地租的限制,在种植上有着更大自由,更容易发展家庭手工业和其他副业。残酷的封建剥削同沉重的人口压力交织在一起,迫使农民扩大经济作物种植和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而家庭手工业的生产大多投入市场转化为小商品生产,于是普遍存在着自给性农业和商品性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商业性农业和商品性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扩大了小农经济容纳商品生产的条件,所以小农经济结构有着对商品经济发展的适应性。

在中国封建社会内,小农经济的发展曾经创造了封建社会的繁荣,但是到封建社会末期,小农经济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结构,限制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阻滞着阶级的进一步分化,堵塞着社会财富积累和社会生产扩大的通道,维护着封建经济,阻碍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明末清初封建社会相对稳定,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都有发展,江南农村中产生了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商业性农业日益发达,经济作物种植区日益扩大。苏松一带形成棉花生产区,很多农户纺纱织布投入了市场;太湖流域形成蚕桑种植区,农户养蚕缫丝织绸是为了出卖。随之粮食生产也进一步商品化。商品经济渗透农村,侵蚀着封建经济,使封建的宗法关系逐渐松弛化,促进着农村阶级分化,产生了经营地主和富农的经营,农村中出现了自由雇佣劳动者。在生产水平低下的历史条件下,富农雇工耕作,采用集约化生产,一般自己也参加主要劳动,指挥管理雇工劳动,产生了劳动社会化的萌芽,并在榨取雇工剩余劳动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再生产。经营地主的雇工经营主要是为了进行商品生产,剥削雇工的剩余劳动以增殖财富,扩大再生产,他们一般不参加主要劳动,

甚至足不履田畴，不知稼穡之艰难，经营管理生产或依靠雇工或依赖管家，有的还出租土地，从事封建地租剥削，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由于受到封建土地制度的制约，江南农村中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其程度极微弱，发展的速度恰似蜗牛爬行一样极其缓慢，迄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前，始终是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孕育。

二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步的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江南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缓慢地发展。

自从上海开埠，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开始伸入江南农村，接着不断发动侵略战争，掠夺到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种种特权，内河航行的开辟，铁路的修筑和营运，运输条件的改善和商业信息传递的迅捷，使大量的外国商品向农村倾销，一些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出口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外国经济侵略势力逐渐渗透江南大地，从城市通过城乡结合点的乡镇，辐射到每个村庄。一方面破坏了原有的农村家庭手工业结构，另一方面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破坏同促进交织在一起，促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发生分化。加上国内资本主义新式工业兴起，对农产原料和粮食的需求日益增加。这些因素加快了农产商品化的进程。经济作物的种植日益扩大，家庭手工业的产品更多地投入市场，粮食商品化的程度也不断提高，许多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直接被世界市场操纵着价格,控制着兴衰的命运。原有的农村中的商品流通渠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改造,农产市场日渐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村阶级的进一步分化,富农和经营地主的的经营都有了发展。到20世纪初,一些开明士绅为了挽救农业衰退的危机,创办了一批带资本主义色彩的垦殖公司,嗣后一些商人投资建立了一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农场。虽然它们或多或少带着封建性,但这是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新的生产力,它们的出现标志着农村中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渡。不过近代江南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极其缓慢,程度极其微弱,只是在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包围中的几个孤岛而已。

近代江南农村仍然是封建经济占着显然的优势,封建土地所有制统治着农村。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后,江南农村遭受惨重摧残,耕地荒芜,人口锐减,封建统治者为了尽快恢复被农民军打乱了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农村中的封建统治秩序,大力招集客籍流民,承租垦耕。客民流动性很大,常有弃佃他迁,以致田地垦而复荒,于是地主不得不承认垦耕的客民取得永佃权,以后农民又大多以预交押金或购买使用权的方式取得永佃权。从此永佃制成为江南地区普遍流行的租佃制度。

永佃制把土地分离为使用权和所有权两部分,称为“田面”和“田底”,佃农取得“田面权”,永久租种土地,地主不能随意夺佃,租额也比普通的租田略低。佃农取得土地的永久使用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定额租制下,佃农交纳额租以后的余额归自己支配。佃农为了争取纳租之后多有剩余,愿意投资施肥,改良土壤,选育良种,精耕细作,这就促进着农业生产率

的提高。但是永佃制是封建土地制度的一种对农民的剥削方式,土地的所有权控制在地主手里,佃农是在保证足额交租的前提下才有永久的耕种权,佃农所受的封建剥削并未减轻。永佃制的租额虽略低于普通租田,但如果把佃农购买“田面权”所付价格的利息计算在内,实际的租率并不比普通租田低。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地主对货币的需求,地租多用折价,折成货币缴纳。江南地主阶级以官僚豪绅地主为核心,大多居住城市,庶民地主也多数住在乡镇,有利于同封建政治势力相结合,往往运用政权力量强迫佃农纳租。开始地主创设“收租局”,由官府指派官吏,掌握收租事务。后来地主自设“租栈”,得到官府支持,派经造吏役,勒逼农民交租。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城里的官僚豪绅地主手里,地租的强制性日益突出,地主同官府的勾结更加紧密。20世纪初地主建立“田业公会”,提出“粮从租出”,租和粮结合在一起,使反动政权的财政收入同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纠结在一起。“田业公会”又从租款中抽出相当数目的钱财送给政府官吏,使官吏的经济利益又和地主的地租剥削直接挂钩。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田业公会”演变为“田业联谊会”,换汤不换药,实际上成为政府操纵下的机构,政府公开支持“田业联谊会”榨取地租。江苏省政府在1947年专门发布《训令》声称,对拖欠田租的佃户,“拘送法院,依法追缴。”地主愈来愈同官府紧密结合,运用政权的暴力收租,使地租更增加超经济的强制性成分。民国年间,许多地方逐渐采用押租制,使佃农在租种土地之前就遭受到榨取。日渐增加的田赋,被官僚豪绅地主勾结官吏,统统转嫁给农民和小土地出租者来负担。加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日益残酷,并且同买办资本和商业高利贷资本

的剥削结合在一起,使农民陷于极端的贫穷落后,农村濒临破产。

三

外国资本主义对工业原料和农产品的掠夺,促进了江南地区农产商品化的发展,农村经济逐步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投入国内外市场的农产品数量不断增长,农业的专业化区域日渐发展完备。苏松和常阴沙等地产棉区,杭嘉湖等地蚕桑区,都是著名的农业专业化地区。经济作物专业化种植的普遍,带动了粮食商品化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进一步活跃。

农产商品化的发展,是同农民的贫穷困苦相联系的。江南农村残酷的封建剥削,急剧增加的人口压力,使农民在贫穷困苦中挣扎,不得不通过多种途径,从事商业性农业生产,以增加收入,缴租纳税,还债付息,以及购置生活必需品,维持最低的生活,同时从流通领域中获取现金,购买种子、肥料和农具,以维持再生产。饥寒像一条无形的鞭子,驱赶着农民进行具有较高收益的商业性农业生产,生存成为农民进行农产商品化的内在动力,外国资本主义对农产品的掠夺,进一步推动着农产商品化的发展。

江南农村一方面农产商品化的程度逐渐提高,更多的农民进出乡镇,在买卖交易的商品经济中,改变着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农产商品化的扩展,是建立在以个体人力为基础的高度集约化生产上,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民仍旧受到传统的宗法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制约,尽量省吃俭用,缩衣节食,压低

生活水准。农民的商业性农业生产,滞留在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里,农村家庭既是农村社会的细胞,又是生产同消费的统一体,在农产商品化的过程中,既是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又是产销结合,组织着商品货币的经济活动,这就使农产商品化的发展,不是把农村导向资本主义,相反却堵塞着农村商品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使小农经济结构的韧性更加稳固。

外国资本主义对江南农村大量的商品倾销,冲击着农民家庭手工业,加上国内现代化大工业产品的推销,破坏了原有的农民家庭手工业结构。贫穷的农户为了生存,不得不适应新的环境,被迫改组家庭手工业,大致是以下几种情形:

〈一〉传统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发生变化。江南地区传统的同小农业相结合的主要家庭手工业是棉纺织业,自从洋纱洋布大量倾销,手纺纱日趋被淘汰,农民遂抓住纺织的最后一道工序,买进机器棉纱,加工织造,出卖布匹。洋纱织布业在江南农村兴盛一时,在买纱卖布的周而复始的运动中,洋纱织布业变成小商品生产。丝织业是江南地区重要的传统家庭手工业,自从人造丝织物和人造丝蚕丝电力交织物在中国市场倾销,江南农户的手工丝织业受到冲击,为了降低成本,进行抗争,农民遂有购买人造丝和洋纱线掺入蚕丝,织绸出卖,出现丝织业的改组。

〈二〉适应出口贸易的需要,兴起了一些农村家庭手工业。如花边抽绣的大量出口,促使上海的洋行通过农村原有的商业体系,利用农村妇女的廉价劳动力,组织编结。川沙、嘉定、无锡等地兴起编织花边网扣,常熟、沙洲、太仓等地出产雕绣花边。又如手工缫丝的大量出口,使农村的手工缫丝业被迫改

变纛法以适应出口需要，南浔、震泽、黎里等地，出现仿照日本纛丝法纺成的东洋经，又有方经、绞经、大经、花车经等名目，售给洋行出口。

〈三〉文化和习俗的改变，促进一些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例如抗日战争期间，江南沦陷，国破家亡，社会黑暗，许多人由痛苦而沉浸于封建迷信中，庙宇寺观的香火盛极一时，大量需求神袍、旗伞、软匾、龕幔等产品，商人放料给农村妇女刺绣。抗日战争胜利后，昆曲、越剧和京戏一度兴盛，各戏班和商贩纷纷到苏杭采办戏装和道具，戏装铺坊制成粗样，勾勒图案花纹，发放给农村妇女绣制。

〈四〉城镇附近的农民往往为工厂或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加工订货。在织布业、丝织业、针织业、刺绣业、制经业等行业中，普遍流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制，城镇附近的农民向工场领料，在自己家内制作加工。现代化工厂也把一些辅助工序，分发给农民，利用农民家内劳动来完成。像火柴厂的火柴盒糊制，织袜厂的缝袜头和剪贴商标等。在这里农民家庭手工业成为工厂或工场的场外组成部分。

〈五〉农民还因地制宜，利用地利、原料的方便和传统技艺等条件，从事农民家庭手工业生产。诸如制作草席、篾席、芦席、竹器、藤器、蒲包、棕刷、扫帚、车木、泥人、雕刻、砖瓦、石工、草帽辫、麦秸扇等等。农民多一条生产门路，就多一分生存保障。

被迫改组后的农民家庭手工业，产品投入市场，同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家庭手工业的自给性日渐淡化，变成小商品生产，江南农村的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但是农民家庭手工业仍然紧紧地附着于小农业，农民依然被束缚

在土地上,利用农闲或间隙时间,从事手工业生产。这种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对于封建剥削和人口压力有较大的负荷能力,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击有很大的适应能力,对于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压榨有特别的承受能力。小农经济的这种结构,表现出顽强的坚韧性。

田少人多,是江南农村的一个突出矛盾。有的农民受到多子女的压力,或天灾人祸的摧残,或因无力承受租税的沉重负担,不得不背井离乡,流入城市寻求活命。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得不到充分发展,农村破产使产业后备军源源不断增加,城市里就业竞争异常剧烈,工厂不能容纳,社会上寻找工作困难,即使有的进厂做工,也因劳动力的价格异常低廉而不能糊口。于是许多流入城市的农民又纷纷返回农村,重新租种田地承受着封建剥削。在这城市与农村人口交流的循环往复中,农民的视野有所开阔,观念有所变化,有的还懂得一些现代科学知识和新的工艺技术,促进着更多的农产品投入市场,更多的家庭手工业为市场而生产,增强着小农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容纳能力。

经过一代代的多子分居,千百万小农经济体像一个个马铃薯,他们缺乏相互经济联系地散布在田野,形成近代江南农村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这种小农经济结构消溶着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侵蚀作用,把商品经济的发展引导向低层次的扩散,不仅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现代化,相反的却排斥着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阻碍着生产的社会化,对大机器工业的产品也进行着顽强的抗拒,缩小着工业品的市场。而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必须以自然经济的解体为前提,小农经济的韧性结构是严重的障碍。这是农村社会生产力长期停滞,农民群众陷

于贫穷落后的最后一个根源。

近代江南农村，社会动荡，生活不宁。战争绵延不绝，烽烟不息，军阀混战，日寇践踏，兵匪蹂躏，盗贼遍地，农民无法安定度日。官吏暴虐，土豪横行，地租苛重，税捐繁多，竭泽而渔，榨干着农民的血汗。物价飞腾，通货膨胀，投机猖獗，农产品价格低廉，农村市场混乱，外国资本主义通过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使农民再受到一次价格上的剥削。水利失修，生产萎缩，灾荒不断，内涝干旱交相袭击。生态遭到破坏，血吸虫病流行，缺医少药，贫病交加啮食着农村。文化落后，科学贫乏，求神问卜，封建迷信泛滥。村庄弥漫着饥寒，田野呈现一片凋零。具有韧性结构的小农经济，在这些灾祸的面前正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显得软弱无力。

四

土地改革胜利后，经过反复实践，不断探索，历尽坎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终于找到一条符合国情，发展农村经济，瓦解小农经济结构，促进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道路。江南农村里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着产业结构单一的传统农业，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农村的活跃，彻底瓦解着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改变着传统的小农经济狭隘意识，增强着农民的现代化思想观念和新的文化习俗。农民摆脱了贫穷，实现了温饱，壮大了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近

代江南农村的历史充分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本书意图通过对近代江南农村发展历史的考察,从中找出中国农村发展史的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一点历史材料,以加深认识我们的国情。由于作者的理论水平和知识基础都很薄弱,未必能达到这个愿望。

本课题的研究,从搜集资料算起,历时十多个春秋,后来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研究课题。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阅读了地方档案馆所藏的大量关于农业方面的档案资料,并较长期的深入吴江县八坝乡、太仓县浏河乡、常熟县周行乡、昆山县城北乡、无锡县堰桥乡、苏州郊区的官渎里、横塘等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把社会学引进历史科学研究。由于本书篇幅有限,许多资料只能留待今后继续使用。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我所患冠心病屡次发作,致研究工作时断时续,得到我的博士研究生单强同志的协助。搜集资料过程中,得到韦恒同志和我的博士研究生朱小田同志的帮助。写作时参考了学术界前辈们的社会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特别是得到了江苏人民出版社张渭英同志的热情支持,使本书得以出版问世,在此一并衷心感谢。

段本洛

1993年4月5日清明节

目 录

序

第一章 明末清初江南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1522—1840年)

- 第一节 商业性农业的勃兴 (1)
- 第二节 农村副业的发展 (22)
- 第三节 农村资本主义萌芽的孕育 (41)

第二章 鸦片战争后的江南农村(1840~1918年)

- 第一节 农业技术和生产力水平 (56)
- 第二节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86)
- 第三节 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变化 (115)
- 第四节 租佃关系和地租剥削 (140)
- 第五节 农村中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 (172)
- 第六节 乡镇的兴起与城市化 (202)
- ~~第七节~~ 农村中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 (238)
- ~~第八节~~ 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及功能 (264)

2 近代江南农村

第九节 农村社会结构和文化习俗·····	(296)
----------------------	-------

第三章 农业危机的加深和江南农村的

破产(1918—1949年)

第一节 农业生产力的停滞·····	(329)
第二节 水利建设和太湖湖田·····	(351)
第三节 农产商品化与产销危机·····	(374)
第四节 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崩溃·····	(396)
第五节 地租形态与租佃关系的嬗变·····	(430)
第六节 苛重的田赋和“二五减租”·····	(459)
第七节 农民对市场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依赖·····	(486)
第八节 农村中的金融资本活动·····	(530)
第九节 新式农场和富农的经营·····	(558)
第十节 农村的阶级分化·····	(593)
第十一节 农村破产和农民的反抗斗争·····	(615)

第四章 土地改革的胜利和江南农村的

春天(1949—1956年)

第一节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江南农村·····	(644)
第二节 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	(650)
第三节 江南农村的春天·····	(656)
附录一 主要参考资料目录·····	(665)
附录二 书中表格索引·····	(685)

第一章 明末清初江南农村 商品经济的发展

(1522~1840年)

第一节 商业性农业的勃兴

一 经济作物的推广

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各国都是从商品农业经济中生长起来的,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是农业中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经济作物的推广,是商业性农业发展的主要标志。

江南农村在明代中叶以后,经济作物的增长已经较为显著。清初至鸦片战争爆发前的一百多年间,经济作物的种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表现为棉花、蚕桑、植茶以及果树、园艺、花卉等种植业的兴盛。

中国植棉始于宋元之际,明朝已逐渐推广到太湖流域。植

棉需要具备一定的气候、土壤和技术条件。江南沿海沿江地势高仰之地,土质粗松,宜于棉花生长。苏、松所属嘉定、太仓都是“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即棉花)。嘉靖时,昆山、嘉定等县,棉花逐渐成了当地的主要农作物。天启年间,松江府属200万亩耕地,“大半植棉,当不止百万亩”^①。太仓州属,“郊原四望,遍地皆棉”。在植棉的生产实践中,江南地区的农民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大大提高了单产量。江南种的亚洲棉“棉之干长数尺,枝间数尺,子百颗,亩收二三石”^②。明代以后,嘉定东南高地,棉七稻三,太仓“种稻之处十仅二三,而木棉居其七八”^③。小民终岁勤动,生计全赖于棉。常熟、江阴等地凡属地形较高,不宜栽稻的地区,普遍植棉。棉花种植区域的扩大,棉产量的提高,为江南地区棉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广大植棉区的农民收获籽棉后,“轧而为絮,弹而为绵,纺之成纱,经之上机,织之成布。……通商贩鬻,北至淮、扬,及于山东;南至浙江,及于福建。民生若无此利赖,虽棉稻两丰,不济也”^④。除了供应本地手工棉纺织业以外,还远销外地。清初,上海所生产的棉花运销福建、广东两省,“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⑤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当时中国的一大产棉中心。详见表 1-1。

①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 35,“养蚕广类”,“木棉”。

②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 35,“养蚕广类”,“木棉”。1石(担)=60.453公斤,下同。

③ 朱延射等《宝山县志》卷 3,第 53 页。

④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道光间刊本。

⑤ 叶梦珠:《阅世编》卷 7,“种植”。